

# 兵马俑坑：“陈兵图”——秦军事生活的代表

## ——关于属性和作用争论的话题

王学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54)

关键词: 秦 兵马俑坑 阵 驻营 幕府

摘要: 秦俑坑内容的设置,旨在表现秦军的强大与战略、战术的精进,因而选取了军事生活中最为典型的例证。那么,1号坑是锋、翼、卫、本俱全,能够“回军转阵”的矩阵;2号坑是有“营”、有“练”的暂驻形式;而3号坑则象征“军幕”。古今中外战例都表明这是列队接战的一瞬间。

KEY WORDS: Qin Terra-Cotta pits Battle array Garrison Tank

ABSTRACT: The major elements of Terra-Cotta pits were arranged to represent the magnificence and powerful of Qin armies and the advance of its military strategies. Thus, the major theme was to illustrate the typical scene of military lives. Since the first pit represents all the sections of 'feng' vanguard, 'yi' flank, 'wei' guard and 'ben' major force, it might have been a battle array which formation can be transformable. The second pit might illustrate the scenes of a garrison in which an army was stationing and training. The third pit might symbolize the general's camp. By combining cases on history, these scenes might illustrate the moment of an army feng just before the initiation of a campaign.

### 一、旧论题再提的缘起

秦始皇陵兵马俑面世已经37年,其间也曾多次开过学术研讨会,但对一些重大的基本问题如秦俑坑的属性问题仍有争议。

截止目前,关于秦俑的作用有几种代表性的说法:

第一种:守京城的宿卫军(又说是“御林军”)。

第二种:象征秦始皇东巡的卫队。

第三种:军队送葬的俑群。

第四种:是表彰统一全国军功所树立纪念碑式的“封”。

另外,还出现过两种见解。一是认为秦兵马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而是宣太后<sup>[1]</sup>;另一是认为秦俑不是兵马俑,而是“秦始皇陵近臣侍卫郎官俑”<sup>[2]</sup>。

### 二、质疑诸说与否定“三军”论

“宿卫军”、“东巡卫队”、“送葬”和“封”之

说,因为涉及到秦俑的性质和作用,还有再讨论的必要。

说一,从某种意义上说,陵墓这种“地下王国”的形式是“地上王国”现实的反映。但是,陵墓制度毕竟不同于京都的建制。况且在中国早期,君主墓葬区还属于都城的组成部分。陵园即使有城,也并不等于是对都城作简单的模拟。尽管后者对前者也许有所借鉴,但有各自的发展序列,因此我们绝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若要说秦俑是“守京城的宿卫军”,那么,远离陵东既然独设一组秦俑四坑,为什么在陵的其他三面没有呢?解释者又说是因为“对秦的威胁来自东方”,那么,这岂不是有违城池守备的部署原则吗?此说未免把城市攻守的军事斗争简单化了,为什么攻秦只来自正面的东方而不会绕行攻击呢?因此,秦俑作为“守京城的宿卫军”一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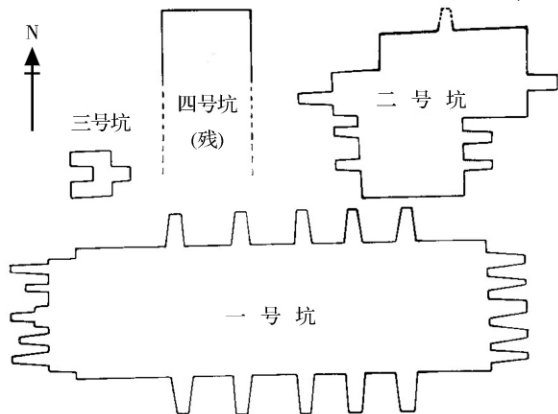
说二,固然秦俑大部分面向东方,但这未必同秦始皇的东巡有联系。因此,“秦始皇东巡卫队象征”之说纯属猜测之想。

说三,尽管有文献记载说,西汉的霍去病、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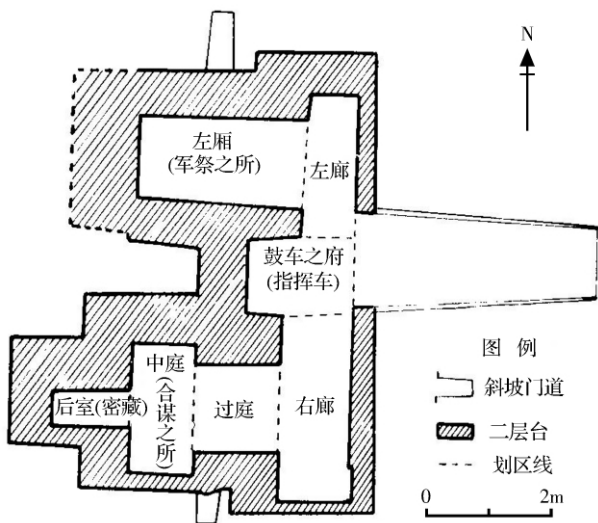
光、金日磾、张安世、王凤等人死葬时,皇帝曾派军队为其送葬。但这是活人(军队)送死人,和秦俑、杨家湾汉俑群的设置截然不同。因为后者是被动的,连本身都属于从葬之物,并不存在“主动”的条件。如果要把这些偶物也都当作“送葬的部队”的话,那始皇陵园近200座从葬坑,是否也是“送葬”的呢?可见在驳杂的内容中任选一种来作解释,都难免不带上随意性了。

说四,“封”是标志,开始是用在坟墓上的。《易·系辞》:“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树不封”<sup>[3]</sup>。目的是封藏起来,不为人知(“不欲著明”)。秦始皇如果是为了“表彰统一全国军功而所树纪念碑”的话,为什么要放入地下封藏起来而使之不显呢?秦始皇曾“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把“重各千石”、“坐高三丈”的12个金光闪闪的大铜人(每个重合30.75吨、高度合7.26米),树立在朝宫前,使天下人尽知。他五次出巡,有七次刻石,坦然在“颂秦德,明得意”<sup>[4]</sup>,其“表彰统一全国之功”的作用岂不更为明显!如果把7000尊左右陶俑独置于地下,封闭起来,不为地上人知,这同秦始皇“明其得封”的用意哪有半点相近之处呢?所以,“以俑为封”之论,同样是难以成立。

那么秦俑,真正的作用何在?我以为按秦始皇的意愿,应是以俑为军,用“陈兵”的形式表现秦的军事生活,便于在阴间世界看到它们。过去有人说:秦俑显示了秦人的“兵强马壮”,这话对死去的秦始皇来说,是可以成立的。但从陵园制度着眼,其内容广博,秦俑坑在类别上和陵园里所有的御府坑、从葬坑一样,都是“外藏椁”(即:



图一 秦俑坑平面示意图



图二 三号坑分区示意图(王学理测绘)

以“椁”——“坑”为单位,藏有物品),统统属于秦始皇陵的外藏系统。

阴间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秦始皇生前既同军队结下不解之缘,便设想以俑代人,埋入地下,并不是用以征伐、戍守,而是再现秦人整肃壮大的军容。那么,以什么形式“再现”呢?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就只能依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给予定性了。

秦俑坑一组共计4个(图一),其中的第3号坑属于“军幕”性质的认识(图二),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但也有个别学者提出属于“军社”(“军伍社宗”)的看法。还有一些学者认为“4号坑”并不存在,只是个天然的土坑。

在承认秦俑4个坑共存的前提下,对第1、2、4号坑的属性问题,有两位学者以表现“三军”的共同主张下又提出了大相径庭的看法。其中一位坚持此三坑分别代表着右军(1号坑)、左军(2号坑)、中军(4号坑);另一位则以为三坑分别属于主军(1号坑)、佐军(2号坑)和后勤部队(4号坑)。

我以为,无论属于哪一个“三军”之说,都有可商榷之处。因为秦俑诸坑中,4号坑未放置兵马俑,“主帅所在”的“中军”还仅限于推测。如把发掘过的1、2号坑,当作“三军”中的“右军”和“左军”,实难看出它们的类同之处。而且“三军”倡导者也没有给出区别左、中、右三军的标志与根据,如果孤立地谈“阵”,其结果必然是

“无坑不阵”(即:既主张3号坑是“幕”,又说是“阵”,竟使四个坑全都成了“阵”),又无处不“阵”(如说2号坑是“阵”,却又把它构成的四个单元也说成是“阵”)。突然用“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偶落钩连,折曲相对”这一泛语硬是套出个“曲尺形方阵”来,就弄得人一头雾水。

“阵说”一出,在社会上掀起“无人不谈阵”的热议。一时间“军阵”成了秦俑最时髦的代名词。说实在话,谈“阵”者未必对“阵”有真切的了解。当然,这也不奇怪。因为两军对战的本身就是一场军事指挥艺术的博弈,要让一般人弄清其中的奥妙就很难。再加之长时期来受小说上“布阵”、“对阵”、“变阵”、“破阵”和阵形演化的影响,弄得眼花缭乱,不由得就产生了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尽管20多年前,我对笼统的“阵说”提出了质疑,发表《一幅秦代的陈兵图——论秦俑坑的性质及其编成》一文<sup>[5]</sup>,也得到“境外”的肯定。但“四坑成三军”的说法在久而久之的“独弹”中,竟成了覆盖学术见解的权威。长期来,误导影响所及,至今的影视媒体仍然在把人们陷于朦胧之中!

在《秦始皇陵研究》一书中<sup>[6]</sup>,我以为秦俑坑之设,绝不是建陵之初的规划。那是在统一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秦始皇才冒出来的想法。表现秦军军事生活,应该是确定了的主题。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军事生活”,而不是“军事”。因为它并不包括理论、战略、战术、命将、兵书等等。即以军事生活而言,内容也甚多,是命将授钺?是告庙献俘?是进军奔袭?是某一厮杀的战斗场面?还是在边防“葺险增垒”?<sup>[7]</sup>等等。可见摆法甚多,但起码不是“四坑皆阵”的这唯一的表现方法。于是,便采取了“陈兵”这一最能代表秦军事生活和军容的形式。以“阵”(1号坑)、“营”(2号坑)、“战”(4号坑)和“幕”(3号坑)四种形式展示,这可说是多种方案中最佳的一种选择。那么,秦俑坑既是最具代表性军事生活的缩影,称其为“一幅秦代的陈兵图”总该是说得过去的吧?

三、秦俑1号坑——不是“圆”,也不是“疏”,而是矩阵

所谓“阵”,实际上指武装了的军事组织,为了取胜敌人,把战斗员按照一定的形式编列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能分散又便于收拢的战斗集体。这种临战队形,就称之为“阵”。由于“阵”是伴随战争而产生的一种组织艺术,又随战争实践而发展成变化无穷的多种形式,遂成为古今中外军事家需要熟谙并探研的一门学问,通常人们也就管这种布阵的方法为“阵法”。

纵观“阵”的构成,它必须具备一些交战、追击、以至退却的基本功能。这就是:

进攻性:对战、追击、奔驰、突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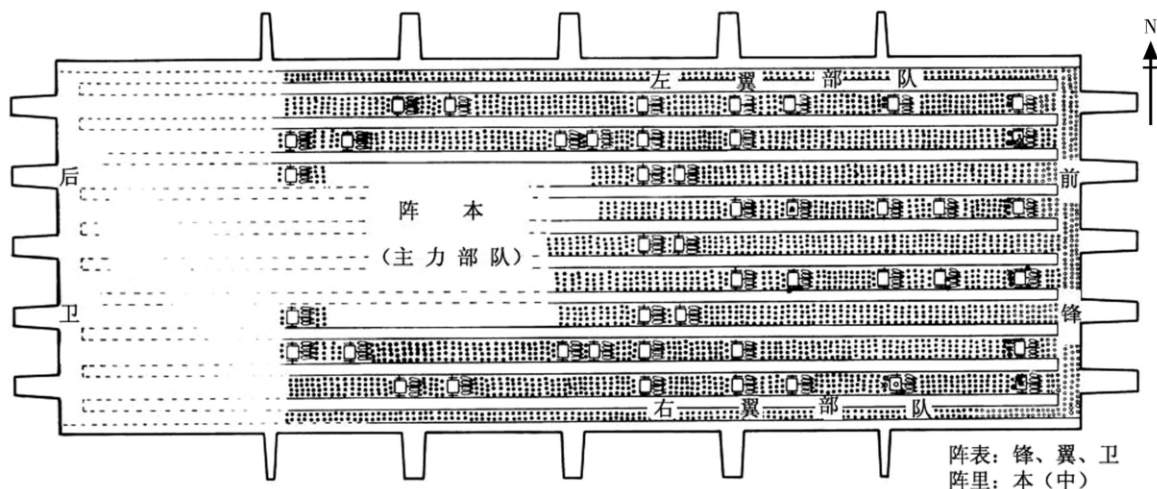
防卫性:守战、掩护、警戒等;

应变性:随战场情况变化而作多种机动转换,做到“五阵相应”;

凝聚性:收拢等;

疏散性:展开、分散、退却时的掩护(殿)等。

古来阵名繁多,但实际上阵形不外乎方、圆、



图三 一号坑兵马俑布置示意图(王学理测绘)

曲、直、锐五种(《李靖问对》<sup>[8]</sup>)。如果从“阵”的含义、阵形变换关系出发,结合秦俑1号坑的形状、结构、兵马俑与战车的布局等,作综合研究,就会发现它是完成了布阵程序的“矩阵”形式。

第一,一号坑是个异常规整的长方形(图三)。坑体长210、宽62米,其中装备的陶质武士俑和战车也随之带有对称性。坑的东西两端各有3排武士俑构成矩阵(即方阵)的“前列”(锋)和“后列”(卫),南北两侧各有一排武士俑构成阵的两“旁”(翼)。这些面朝四方坑壁的俑群,从而形成了“阵表”。而中间以第6过洞为中轴线的那些面东的车卒,即是“阵中(可称“阵体”或“阵本”)”。那么,1号坑有以弩兵为“表”、步车协同为“里”的矩形阵列,不正是《李靖问对》<sup>[9]</sup>中“方所以矩其步”的具体化吗?

第二,因为“阵中”的车马和武士俑面东,阵表的前后及两侧的武士俑全是面向外,显示了整个俑群具备着锋、翼、卫、本几个方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号坑东端有3列作横队队形的立俑,每列68,计204个。他们中除过3尊戴长冠的甲俑外,其余的身著战袍,腿扎行滕,足登浅履(有带鞋)或履(无带鞋),免胄束发,手执弓箭,显然是些“善发强弩,远而必中”的摧锋之士<sup>[10]</sup>。反映了秦军是一支攻击型的部队,其战法必定是先以万箭齐发,使敌军“绝行乱阵”<sup>[11]</sup>,后续部队再源源冲击,擒敌杀将。在前锋部队之后,紧跟的是38路纵队的“本甲”部队。他们身著铠甲,免胄或戴帻,护腿以膝缚、胫衣或跗注,手执戟、铍、矛、戈等长兵器,显然是些“跼踵科头,贯颐奋戟”善于白刃格斗的“虎挚之士”<sup>[12]</sup>。全坑约有俑、马近乎六千,车马同徒卒相间,而且在一些特定位置的战车上站有握剑的指挥者,从而组成军队的主体。这种有“锋”有“后”的安排,完全符合阵的要求,正同一把利剑之有“锋”有“茎”一样,“相信不动,敌人必走”<sup>[13]</sup>。从总体上不但真实地再现了秦国作战时“强弩在前,铍戈在后”<sup>[14]</sup>的武器装备原则,而且也体现了方阵部署兵力时要“末甲(指前锋部队)劲,本甲(指阵中部队)不断”的气势。

在俑群南北两旁的武士俑,多穿铠甲,手里拿的兵器无一例外的是远射程武器的强弩,而且面向军阵两侧,这就是方阵的两翼。位于俑群后

部,即一号坑的西端,面西的三排俑作横队排列,这就是方阵的卫部。两“翼”和“卫”的作用在于防备敌人拦路截击或包抄后路,以保障自己军队的战斗行动,完全服从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略目的。

第三,《孙臆兵法·十阵》在描述“钩行之阵”的格局时说“前列必方,左右之和必钩。三声既全,五彩必须具备,……无前无后,……”<sup>[15]</sup>。左右两“和”在矩阵中称之为“左孟”、“右孟”,晋、宋人称其曰“左甄”、“右甄”,均指军阵的两翼。钩,具有迂回、曲折、勾连的意思。1号坑军阵俑群的锋部,横列整齐。两翼向东延伸,又有6尊俑包在“锋”之两端,“卫”部的情况也大概如此,这正是“前列必方,左右之和必钩”的形象。一旦对阵破敌,就会形成包抄。后卫俑群的排列同前锋俑群一样,相当地齐整,可说是“无前无后”的装置,也正是适应了“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sup>[16]</sup>的需要。虽然在坑内未发现旗帜,但作为军事指挥系统的钟和鼓则多有出土,当是阵形完整的又一证据。

正因为“钩行之阵”的“前列必方”、“无前无后”就表明这种阵形的本体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方阵。而秦俑1号坑的长方形结构,无疑就是一个巨型的矩阵。它确实实地具备了进攻、防卫、应变、凝聚、疏散的一些战术性能。

通过对秦俑1号坑的剖析,除确认锋、翼、卫、本这几个阵的基本要素之外,还使我们看到阵体在布置上有“兵力部署上的对称性”、“行列上的规正性”和“总体上的统一性”这三个特点,从而坚定1号坑确实属于“矩阵”的这一判断。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矩阵在战斗中的运用,以便进一步认识秦俑编成的认识基础及其意义。

首先,矩阵编列,正显示出“阵表坚利、阵体雄壮”的布阵思想。秦俑矩阵之“表”,由前锋、两翼和后卫组成。阵体部分,是个浩浩荡荡的武装力量。有38列纵队,武士俑数约有五万左右,占全坑的85.6%。其中撰甲的重装步兵俑手执格斗的长兵器,成群的单独编列,或簇拥战车。各级军吏俑按单元、成系统实施指挥。

战国杰出的军事家孙臆总爱用“剑”来比喻“阵”。他以“末”之劲锐、“刃”之锋利、“本”之

鸿深为例,可说是很形象而又寓意颇深的。秦俑矩阵在武器装备上,采用“强弩在前,锁戈在后”的安排。可见其“表”正合于剑刃的要求,“阵体”又同“剑本”牢固的结构相吻合,确与战国时期的战术思想相一致。

其次,静态中看到“疏阔其表”的现象,实际上隐含着接战时的队形变化。

在春秋时期的车战中出现了一种叫做“角”的追击队形,到战国时期随着步、骑兵的兴起而追击和遭遇成了进攻的主要形式时,它又演变成“雁行之阵”。那么,秦俑矩阵执弩的前锋在射击之后,可随即分开居于两侧给作战的主力部队让路,也可和随后的主力分开(G6为中分线)形为犄角,夹击敌人。在实施追击时,由弓弩手配合用弩的战车组成强力的战斗力量,就会沿着敌军两侧运动,迅速展开雁行之阵,以便于进行有效的侧面攻击。当然,按照攻击型的秦军特点,它也可以把纵深进攻的矩阵变成“冲坚毁锐”的“锥行之阵”。因为这种末锐、刃薄、本鸿的阵形,适宜在快速进攻中对敌军穿插、分割而“决绝”的<sup>[17]</sup>,况且它又同雁行之阵本来就有着转换的关系,所以也应是秦军正面对付敌阵经常采用的形式之一。

其中的第二种正是“雁行之阵”的攻击方法。当两军对峙时,双方谁也不敢率先行动,往往是极力避开正面而以一部分兵力袭击敌军翼侧的。这就是孙臆说的“微阵以触其侧”的战法(《孙臆兵法·威王问》)。秦俑矩阵处于屯聚状态时,对两侧袭来的敌军也能立即左右旋转,变成作战的横队。至于矩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的变换,在这里更是无需赘言地便当了。所以从战术角度看,古今中外有着很多相似的战法。而作为阵法的变换,在古代中国则更有其独到之处了。

“变”与“应变”是军事指挥者才能和素质最集中的表现。何良臣曾说过“用变取胜,各有神异”<sup>[18]</sup>。秦俑矩阵虽处静态,但从直观中却隐匿着这个“变”字。

再次,车步协同,疏密应时,是秦军多兵种作战的一种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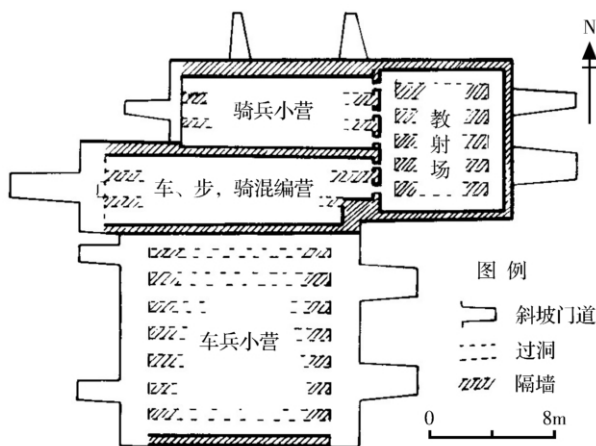
《吴子·料敌》中在谈到破六国阵法时,给了秦军的作战队形以“散而自斗”的评价。这种状况也许是战国初年秦军的实情。但它则从另

一个侧面透露出战国时期在野战进攻战术上确实是与前大不相同,绝非秦国独出于此。因为任何时期,单兵是不可以言战的,秦军的“自斗”也绝非是个人的竞技行为。车战时期的军争,作为一场有组织的武装冲突,是殷周以来密集的车阵战的延续。到了车、步、骑协同作战时,战斗队形也就很自然地要转向便于作战的疏散配置。所以这时期的军事理论著作,如《司马法·定爵》就说:“凡阵,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sup>[19]</sup>《尉缭子·兵令上》也说“阵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出卒阵兵有常令,行伍疏散有常法,先后之次有适宜。”<sup>[20]</sup>

《史记·张仪列传》:“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sup>[21]</sup>这大体上勾绘出秦兵种的构成比例是1000:1:10。秦俑一号坑内估计可出土武士俑5700尊左右、驷马战车40余辆。如果除去阵表的步兵俑1300尊,阵本部分随车甲俑大约是每车百人,这合于1:100之比。但是,具体到坑内每乘战车的随员数额上,就大相径庭了。无论怎么说,这一时期车后随员人数比春秋时期要多得多,这正反映出自由民充任甲士的身份远在徒卒之上,自然成了作战的主力。所以我认为,秦俑一号坑不是纯粹的车阵,也不是纯粹的步阵,更不是以车为主的军阵,而确实是以步兵为主、伴有大量战车的矩阵编成。

秦俑矩阵本部的车、步作横和纵向的间隔排列,实际上是一种有纵深的密集配置。从横向看,第一行有驷马战车六乘,分别位于G2、G3、G5、G7、G9、G10等六个过洞里,其中除G2、G3和G9、G10四个过洞的两辆相并外,G5和G7的车则是隔有步兵队列的。像这种两车相并、车步相伴的情况,在以后行里的其他过洞中也均有出现。从纵向看,每一过洞的编列则是步、车相接的关系。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观察,还可发现阵本部诸车无论是总体或单体(包括相关的双车)都为同向的步兵所簇拥着(即每乘战车的两侧和前部都有步兵俑)。总前所述,步、车间隔排列,彼此不留空隙,而又由矩阵本身所赋予的纵深,从而使得这个阵容对敌具有排山倒海之势、泰岳压顶之力。

秦俑矩阵阵体的作战单位是什么呢?很可能还是由战车和步兵协同组成的。这可由钟、鼓



图四 二号坑驻营示意图(王学理测绘)

的指挥车、军吏俑及武轂俑、长冠俑所处的位置得到说明,如 G2 和 G3 的一行两车同二行的一车之间,除过各车的三个乘员不计外,前有免胄束发的甲士,后为戴武轂的甲士,各占三个过洞,排列得相当齐整。相对地,在 G9、G10 的战车之间,也是这种安排。车步相间,密切配置是秦俑一号坑布阵独有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就使得它同前此的车步协同作战的“鱼丽之阵”相似而又相区别。

#### 四、秦俑 2 号坑——不是“前角后骑的曲形阵”,而是兵营的暂驻形式

二号俑坑的平面呈向东的曲尺形(图四)。按放置俑、马、车的内涵说,坑内明显地分成为四个独立的区域(编号:Ⅰ—Ⅳ)。

从四区的文物布置看,2 号坑武士俑、战车和骑士俑尽管无一例外地面向东方,但无论如何从总体到每一小区都还看不出有布阵的考虑,也缺乏阵的性能要求,这表现在:

第一,没有战阵的性能要求。仅以Ⅰ区的弩弓兵种队列为例,中心四个过洞中有 160 尊蹲姿弓射甲俑,而外圈有著袍的 172 尊立射弩俑围绕着,共同形成为方块式的结构。似乎“有表有里”,但它缺乏一号坑前锋那样轮番射击的配置,而且“锋”与“后”不清。如果以作为“角”的追击队形,是很难从左右两侧包抄接敌的。况且这部分俑群处于二号坑“主体”力量的一隅,固然“外向”暴露充分,射界开扩,但“内向”单薄,缺乏接应。所以从这三点上看,还不能说明Ⅰ区就是

“弓弩方阵”的。

若果我们进而观察,还可发现这四个区的兵种布置,一是彼此关系松懈,对机动转换并无阵形应变的设施,“聚”无中心更形不成表里;二是前、后、左、右四个兵力单位平摆,并没有形成“以剑喻阵”的那种整体,故而也是难于体现对阵的目的。

第二,缺乏出战程序的编排。《孙子兵法·行军篇》:“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sup>[22]</sup>在车战时代,军事家是把先出轻车当作判断敌情布阵的一个重要标志。可见在担任掩护的机动车辆未“出”之前,整个战斗车乘和战斗员是处在一个行进或隐蔽的状态。出自布阵的需要和方便,当然就有一个“先出”和“继出”的问题。

由 1 号坑的队形排列,再结合文献,大致就可以使我们推知“秦阵”的战斗员和武器配是:“强弩在前,铍戈在后”<sup>[23]</sup>。固然在秦俑 2 号坑里虽有居前的弓弩(Ⅰ区),但既看不到“前列”的战斗位置,也显示不出车、步、骑几个兵种的衔接关系来。不仅 2 号坑的整体布置同“阵”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二线三区(Ⅱ~Ⅳ)中任何一个单元都没有阵的要素,因此“大阵包小阵”的说法只能是一种主观推测。

2 号俑坑各区内武士俑、战车、乘马的安排,各有重点,自有配置。Ⅱ区系战车,Ⅲ为车步间隔(但随员不定、殿骑不整),Ⅳ区由六车居前、骑兵大队随后。各区兵种及其所用兵器,固然因为战场的需要而随时调出,发挥其优势,但彼此间并未受到程序的制约。所以,从整体上绝不是什么“前角后骑的曲形阵”。

既然秦俑 2 号坑不是“阵”,也不是三军中的“左军”,那是什么呢?我以为是暂驻形式的“营”:

首先,并列的三区中由结构到内容,兵种及战具的组合给出“驻营”的作用。

Ⅱ区占南侧 8 个过洞(G1 至 G8),每条过洞有战车 8 乘,共计 64 乘战车。每车乘员三俑,中为“车御”,两侧分别是握甲、拄长兵器的“车右”和“车左”。此区既无随车武士俑,又不见钟鼓,更无阵形“表里”的存在。所以并非“车阵”,而属于“车营”。

战国以来由于步、骑兵兴起,战车退居于次

要地位,再无单独列阵对战的记载。正因如此,战车的作用就随“车阵战”变“步骑战”而变。车的作用或是同步、骑兵配合,或是作机动的补阙之车(即“游阙”)和独立冲刺的“轻车”。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中,“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sup>[24]</sup>,显然是用游阙来补充左翼方阵的。秦俑2号坑车兵小营,应该才是战车作用转变的实例。

鉴于战国时期多兵种参战,特别是“车步协同”、“长短兵器配备”的特点,再加之“入营暂住是为了出营列阵”方便的考虑,按照由“表(锋、翼、卫)里(本体)成阵”的基本要素,可以断言2号坑的Ⅲ区和Ⅳ区里还有“车、步、骑混宿小营”(G9、G10)、“车、步同宿小营”(G11)、“车、骑同宿小营”(G12~G14)等。从这一点上也说明2号坑绝非是“大阵包小阵”。

其次,校场及习射场面,是驻营练兵的生动写照。

秦俑2号坑东北角有个前突的部分(Ⅰ区),其中俑群呈方块编制。中心有八列160个蹲姿甲俑。两侧共有六列84尊作“丁字步”站立的袍俑,东西两端分别站有60和40尊袍俑与甲俑。两侧和两端的立俑组成这一小区外围,把蹲姿甲俑包在里面,显然是个有表有里的结构。但无论立式或蹲式的武士俑,都作持弩的手势与身姿,除中心有个别的弓箭遗留之外,外围未发现任何一件兵器。而在俑群左后部,仅有一将一佐的两尊军吏俑。很明显,Ⅰ区是附属于营供教阅练兵的“校场”,俑群表现的是“入列式”的习射场面,两军吏也许正在教习或督察。这场面,显然同阵形没有任何关系。

再次,营、校隔断,处在营门之外,符合设营原则。

在2号坑的4个区域里,Ⅱ、Ⅲ、Ⅳ区之间互不相通,Ⅰ和Ⅱ间也不能直接往来。惟有Ⅲ、Ⅳ区内的5条过洞的东端,有5个小门可以通向Ⅰ区。校场附属于营,营内按军事条令自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尉繚子·将令》:“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廷。……将军入营,即闭门清道。”<sup>[25]</sup>将军受命,身负重托,居营忙于军务,自然要断绝同外界的交往。杜佑《通典》说到安营之法,是

“每一大营有四十子营。”秦俑2号坑内,容纳有弩、车、步、骑等四个兵种939人、马472匹、战车89乘,就是一座庞大的军营。而其中的Ⅱ、Ⅲ、Ⅳ四区,就是依兵种的不同与为了出战的方便而安排的子营。按规定,各级军吏各有“分地”,在营区各有“行垣”,彼此不得随便往来<sup>[26]</sup>。显然,2号坑Ⅲ、Ⅳ区各过洞的小门,也即是子营外出的“横门”(也称“衡门”)。至于将军坐营的“军门”或“辕门”<sup>[27]</sup>,大概是放在了二号坑之外,或许就没有,在这里重在表现营中之兵,故而只有象征或作了省略。

我考定秦俑2号坑为“驻营”,为何不表现“宿”,而是一律面东整装待发的姿态?我的答复是:营不单是为了“宿”,而且“练”又往往是营地生活的主要内容。秦俑2号坑表现的正是出营列阵前的一刹那,旨在反映秦军军容雄壮整肃、兵马机警求战的风貌。如果这里表现的是解甲卸鞍、兵眠马卧的倦态,从视觉效果看,人们的感触又将是如何呢?那么,在这里用上“大营包小营”的形式,不是更能显示秦军生活的多彩么?

#### 五、4号坑——并非后勤部队的“左追蓐”,而表现的是列队接战的一瞬间

在秦俑一号坑之北,当二号和三号坑之间,有一南北向的土壤。经秦俑考古队钻探,确定为一处拟建中的俑坑,编为第4号。我推断是个拟建列队对战的形式。考虑是:

第一,它不大像中军或后勤的配置。除过作为指挥所的3号坑外,以左、中、右三军而论,1号坑是阵,2号坑是营,4号坑就难说是左军或右军的编制。如果以三坑为三军的话,那表现的也只是战时的布阵,毕竟还不是秦军军事生活的全部,更不是军事活动的代表。如果4号坑以主军、佐军、后勤当之,均同加宽横向的大排面发生矛盾。

第二,秦俑4个坑,其中表现接敌的前奏阶段——列阵(1号坑)、驻营(2号坑)和指挥所——军幕(3号坑)都是静态的模拟。如果接到应战的号令,车驰卒奔、万矢交坠、干戈并举的一幕就会呈现眼前。最能表现秦军风貌的是“顿足徒跣,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sup>[28]</sup>、“捐甲徒

程以趋敌”<sup>[29]</sup>。那么,秦俑4号坑如果是这一表现内容,岂不是对前3坑的补充与完善?

第三,古代中外作战队形多是大排面的横队。如:古埃及,是把步兵作为作战的主力来部署力量。射兵(弓箭兵、投石队)在第一线,后面紧跟着是一字排开的长矛队、短剑队和狼牙棍队。战车则是排在步兵方阵之前,以便接战时冲乱敌方的阵形,为步兵创造战机。骑兵却是分散在步兵方阵的两翼。以车为锋、两翼辅之以骑,横向部署,这就是有名的“埃及步兵方阵”。亚述是按步兵使用的兵器种类(如盾牌、弓箭、长矛)由前向后排列,组成步兵方阵,再把战车和骑兵各自平分后排在步兵队列的两翼。这种兵力部署,同样是横向展开的。

实际上,我国古代阵战的攻击早就采用了横队的这一战法。“牧野之战”是车步相间配置的一线横排方阵的典型。双方作全正面冲突,战术变化是不大的。春秋初期攻车编制除过车士三人、车下甲士七人外,有隶属步兵十五人,实是西周以“两”为单位的二十五人制。春秋中期虽然还是以车兵为主,但车下隶属步兵人数增加,攻车编制成了七十五人制(即“三两”)。车兵和步兵则是以“卒”为战斗单位的编制,使车兵和步兵的依存关系比过去更加重要,而战斗队形无论是步卒在战车前,使三“两”作“一”字排列,或是战车在步兵前,把三“两”作“品”字排列。即如“先偏后伍,伍承弥缝”的“鱼丽之阵”,也不脱离大排面方阵的特点。尤可注意的是,战车同三“两”隶属步兵配置比过去更为疏散了。因为不如此,战斗力量是难于有效发挥的。所以《尉繚子·兵令上》就强调说“阵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sup>[30]</sup>《孙臆兵法》是把横向延长的军阵(“延而衡”)作为“击锐之道”来使用的;同样,为了对付“延阵以衡”的强敌,自己又需用三分之二的兵力“延阵张翼”、再加上“材士练兵”,猛攻敌之要害,就可“杀将击衡”<sup>[31]</sup>。吴起说秦阵“散而自斗”,实际上并非是离开大部队的人自为战,而是由于队形配置疏散,为使战斗单位的作用大大发挥创造了条件。那么,此语该是秦军横队进攻的形象化概括,尤其需要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才对。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尽管各兵种的地位及其

作用,往往因出现和消长的过程而有所不同;尽管有单兵种作战和多兵种协同的区别,但从攻击队形看,毕竟以横队为常。即使是火器出现于战争舞台之后,直到立体的近现代战争,其地面部队的阵地战、包围战等等,光有纵深是不够的,也都需要一个更为宽阔的界面。

进攻型的横队,一般地说也是方阵。那么,人们还可能提出这样的反问“怎么能说四号坑不是别的阵形呢?”我回答是“有可能。”但在这里有几个时代因素提醒问者需加以考虑,并以此来判断其可能性的大小:

第一,秦军是个攻击型的队伍,很少守阵;

第二,表现统一战争时冲击的场面似乎比别的阵形更为壮观;

第三,秦俑坑旨在表现秦军兵强马壮,绝不限于对个体的刻画,从整体上除过选取有代表性的军事生活之外还能有什么?

## 六、结论

秦俑坑作为秦始皇陵园的外设,同“马厰坑”、“百戏俑坑”、“珍禽异兽坑”、“甲库坑”、“铜车马坑”、“祭祀坑”一样,都是旨在表现死者生前生活内容的从葬坑。在陵园中,有了表现生气勃勃的养马业、藏量巨大的武库、豪华的御用车马、珍稀动物的苑囿和丰富多彩的乐舞百戏,而再现兵强马壮的军事生活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

表现秦军事生活内容最具代表性的是阵、营、战、幕四种。因此,秦俑四坑并非单一地都在表现“阵”。车、马、俑的编列和数额固然带有“象征性”,但表现形式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秦俑四坑具体化就在于:一号坑为“矩阵”,表现长方阵的编成;二号坑为“营练”,表现习射与暂驻;四号坑为“接战”,表现横排对敌;三号坑为“幕府”,表现运筹、卜战与机藏。坑位在排列上,阵、营、战等三坑置前,指挥在后,才符合“出卒陈兵”的原义。

[1] a. 陈景元. 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J]. 大自然探索, 1984(3). b. 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J]. 中国科学探险(2). c. 兵马俑真相——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



- 皇[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
- [2]刘九生.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J].唐都学刊,2009年(2):8-13.
- [3]周易:系辞下[C]//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87.
- [4]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4.
- [5]王学理.一幅秦代的陈兵图——论秦俑坑的性质及其编成[J].文博,1990(5).
- [6]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7]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臧兵法:威王问[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42.
- [8]骈字类编等译注.武经七书:李靖问对(卷中)[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9]同[8].
- [10]诸葛亮.孔明心书:择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 [11]华陆综.尉繚子注译:兵教(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70.
- [12]战国策:韩策(一)[M].上海:上海书店,1987:31.
- [13]同[7]:势备.
- [14]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273.
- [15]同[7]:十阵.
- [16]李筌.太白阴经全解:教旗[M].长沙:岳麓书社,2004.
- [17]同[7]:十阵.
- [18]何良臣.阵纪:阵宜[M].长沙:岳麓书社,1997.
- [19]司马穰苴.司马法:定爵[C]//武经七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0]同[11]:兵令上.
- [21]同[14]:张仪列传.
- [22]孙武.孙子兵法:行军篇[C]//武经七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3]同[14].
- [24]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二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1:740.
- [25]同[11].
- [26]同[11].
- [27]孙武.孙子兵法[C]//曹操注.十一家孙子.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1.
- [28]韩非.韩非子:初见秦[C]//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
- [29]同[12].
- [30]同[11].
- [31]同[7].

(责任编辑 谭青枝)

(上接 25 页)

两壁相对应各画 6 位姿态各异之人物,分别做行走、直立、持物等姿势。

后墓室为仿木结构穹隆顶式建筑,四壁角各画红色立柱一根,柱头绘斗拱,四壁壁画均含于立柱间,每一壁面及穹隆顶上绘画题材各异,自成体系,东壁所画内容为乐队图、舞女图、童子与贵妇图,展示了王府深宅大院里的贵族娱乐生活场景。北壁画面已被人为严重破坏,砖墙裸露,泥皮斑驳,可辨共有人物三人、树木两棵、花草一株。西壁绘 6 扇屏风仕女图,各扇屏风规格、形制基本相同,纵长方形,屏面布局划分为上、下两格,上格内施明黄底彩,正中画大朵宝相团花,下格原画仕女图,现仅存一幅,为一冬装仕女形象。南壁画大幅白鹤戏花方障图,下部已缺失。室顶涂刷青灰色彩,其上无规律散布众多白灰圆点,象征星空,东、西两边未见日、月图案。

#### 四、结语

##### 1. 李邕墓志中明确记载了其为祖父李凤的

祔葬身份,说明唐献陵陵区内陪葬者具有各自的家族墓园,这对研究陵园整体布局、设置具有重要意义。

2. 李邕墓使用了前、后双墓室形制,超越了王的丧葬制度,前有资料和本次发掘皆证明,在位皇帝之长辈具有特殊身份,亦可用前室较小的双墓室葬制。

3. 李邕墓壁画设计为连续长卷式,具有一定故事情节,是装饰壁画新的设计理念。

总之,唐嗣虢王李邕墓墓葬封土、形制、壁画、墓前遗址规模均反映了盛唐时期王或王以上等级的丧葬标准与规格并有一定新意。

执笔:张蕴 卫峰 马明志 高明韬

照像:张明惠

绘图:赵赋康

(责任编辑 朱艳玲)